

金融发展抑制腐败关系网的路径和机制*

王 勇 王鹏飞 张佐敏

内容提要:运用金融功能观和效用函数模型可以揭示金融发展减少官员腐败关系网的腐败剩余,从而发挥抑制腐败作用的机制和路径,辅以2003~2016年中国30个省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官员腐败具有传染性且损害经济增长;金融发展能够通过金融功能的扩展与提升削弱关系网腐败的联结程度和覆盖范围,监督腐败关系网的经济活动。在促进经济增长诸多途径中,不仅金融发展自身,而且其通过抑制腐败关系网而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是显著的。针对中共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效果的检验表明,高压反腐不仅有效遏制了腐败蔓延、净化了执政党队伍而具有正向经济效应,而且强化了金融发展对腐败关系网发挥遏制作用的机制。

关键词:金融发展 腐败 经济增长 腐败关系网 反腐败

一、引言

政府官员对中国经济增长发挥着巨大作用^①。各级官员基于“发展是硬道理”,展开了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官员晋升锦标赛^②,官员升迁概率与当地GDP增长显著正相关,形成了地方官员晋升的政治激励假说。然而,索尼娅·奥珀(Sonja Oppen)和斯蒂芬·布雷姆(Stefan Brehm)首次指出了这种“绩效-晋升”模式的局限性,发现官员的核心关系网络对其晋升拥有解释能力,成为这一理论视角的开创性研究^③。

回溯历史,社会学意义上的关系网在中国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中国自古是人情和关系社会,所谓门生故吏、远近亲疏等社会传统心理根深蒂固,但关系化生存则为腐败滋生提供了丰沃

*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制度嵌入视角下离岸金融发展的经济效应研究——基于跨国数据的多层统计分析”(71663015)的研究成果。

① 张军、高远:《官员任期、异地交流与经济增长——来自省级经验证据》,《经济研究》,2007年第11期。

② Hongbin Li and Li-An Zhou, “Political Turnover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Incentive Role of Personnel Control in Chin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 89, No. 9, 2003.

③ Sonja Oppen and Stefan Brehm, “Networks versus Performance: Political Leadership Promotion in China”,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Lund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 2007,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45532493>.

的土壤。“官商共同体现象”^①、落马高官“拔出萝卜带出泥”、“塌方式腐败”现象背后正是关系网腐败的现实。

与此同时,经济增长离不开资本积累,为资本积累动员足够的金融资源是任何国家经济起飞的必要条件。金融体系不仅可以促进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发明,而且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②,中国经济受益于改革开放后的金融迅猛发展得以快速增长^③。在中国“绩效-晋升”模式下,各级官员借助金融资源致力于推动经济增长,可资佐证的是长期以来中国大面积涌现“地区金融中心热”,“铸造金融支柱产业”的地方发展战略屡见报端^④。地方官员拥有影响银行信贷的充分动机,政府对银行的所有权又为之提供了可能^⑤,但是,腐败官员却控制金融资源、甚至以金融监管的自由裁量权设租。因此,官员腐败关系网渗透至金融领域,金融发展能否抵制官员腐败、正常配置资源,最终促进经济增长是一个亟须重视的议题。回答该问题不仅可以正确理解金融发展在反腐败中的作用,更能够为金融发展抑制腐败关系网,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找到新的解释路径和维度。

至少在我国的认知范围内,目前还鲜有涉及金融发展对官员腐败关系网抑制作用的文献,既有对腐败的经济学视角实证研究多从财政预算公开^⑥等方面展开,而本文尝试另辟蹊径:从腐败官员的关系网络入手,将研究框架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以金融功能观理论阐述金融发展抑制官员腐败的三条路径;二是基于效用论对腐败官员“筹集份子钱”的行为建模,以严密的数学推导揭示金融发展改变官员腐败关系网的腐败剩余从而发挥抑制作用的机制;三是在传统研究经济增长的框架内建立多元回归模型,采用2003~2016年中国30个省市面板数据对前述理论路径和机制进行实证检验。如此不仅能够深化金融功能观理论,客观评价中共十八大以来反腐败的政策效果,而且对于探索金融发展的反腐败成效、促进金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二、理论路径和作用机制

(一) 官员腐败与腐败关系网

新经济社会学认为人们“嵌入”在社会关系网络中传递信息、产生信任、建立预期并履行规范,以实现个体和群体的目标。“关系”一词在中国具有感情、人情、面子、回报等丰富的行为内涵,“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网络是调节中国人社会行为的机制之一,被简称为“关系网”,也叫“圈子”,关系网中的成员被称为“圈内人”。圈内人借由中国传统人情交往,通常是“凑份子钱”,形成稳定的投资和交换关系,最终建构其间的信任、义务和预期。

官员腐败关系网是腐败与社会关系网络的紧密结合。一方面,腐败是维持社会关系网络的重要手段。腐败官员常常利用手中权力“敲竹杠”,肆意损害社会资本单元的生产动机,遂成为

① 房宁:《我国反腐倡廉的形势、特点与制度建设》,《科学社会主义》,2015年第1期。

② Robert C. King and Ross Levine, “Finance, Entrepreneurship, and Growth: Theory and Evidence”,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 32, No. 3, 1993;陈雨露、马勇:《大金融论纲》,第1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③ 王志强、孙刚:《中国金融发展规模、结构、效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分析》,《管理世界》,2003年第7期;范从来、盛天翔、王宇伟:《信贷量经济效应的期限结构研究》,《经济研究》,2012年第1期。

④ 根据公开资料统计,海南省、青海省、内蒙古自治区、河南省、山东省、湖南省、福建省等,以及广州、深圳、郑州、杭州、海口、长沙、苏州等城市皆有此规划。

⑤ 李维安、钱先航:《地方官员治理与城市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经济学》(季刊),2012年第4期。

⑥ 郭剑鸣:《从预算公开走向政府清廉:反腐败制度建设的国际视野与启示》,《政治学研究》,2011年第2期。

经济发展的“掠夺之手”。于是,人情关系代替了应有的法律关系,监督关系蜕变为保护关系,如此,社会关系网络异化为腐败关系网。另一方面,腐败关系网也是官员腐败的存在方式。社会关系网络作为人际关系的非正式规范,实际上是一张以自我为中心的信任网络。腐败关系网会凝聚成潜在社会资本,不仅能够让圈内人交流信息,还能在经济行动中调动和交换某些特殊资源,保障个人承诺和组织认同,选拔圈内值得信赖的人,便利腐败官员牟取和交换利益,因而腐败关系网成为官员腐败的典型体现。

(二) 金融发展抑制腐败关系网的路径分析

根据罗伯特·C·默顿(Robert C. Merton)提出的金融功能观理论^①,金融发展就是金融功能的扩展与提升,其对腐败关系网的抑制作用可以通过以下路径实现:

1. 金融发展可以有效降低腐败关系网的联结程度。由于融资约束广泛存在于中国企业创新活动中^②,企业通过政治关联加入到腐败官员的圈子就可能成为其被动或主动的选择,而金融高度发展则可以缓解融资约束,降低企业融资交易成本。同时金融发展程度与资本配置效率显著正相关,丰富的金融产品为社会风险提供交易、转移和抵补机制,资源的市场配置还能够激励并约束金融中介不断自我完善。因而发达的金融业可以减少腐败官员对金融产品的掌控,降低圈外人通过政治关联或金融关联成为圈内人的动机,削弱腐败关系网的联结能力。

2. 金融发展能够有效缩小腐败关系网的覆盖范围。腐败关系网以腐败官员为中心,内部信息沟通和资源交换成为其互信的基础,高度发达的金融行业能够最大程度消除信息成本,表现在金融合约安排的“信息生产”功能可以消除市场不完善^③,避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金融发展在“跨时间、跨空间转移资源”过程中衍生出的金融制度和相关法规,不会顾忌“人情面子”,更可以发挥外部治理效应,推动市场交易透明化,产生信息揭示的帕累托改进。此外,金融深化促进了监管体系日臻成熟,“三反”^④制度建设及创新迫使腐败关系网的信息成本上升,因而可以有效震慑腐败官员收缩关系网。

3. 金融发展能够全程监督腐败关系网的经济活动。官员腐败实际上是违背公众信任、不能正确处理其与公众利益的委托代理问题,而金融发展提供了解决代理人激励问题的诸多途径:金融中介通过甄别投资项目优劣,建立起与投资者共担风险的管理机制,发挥外部贷款人的作用,激励企业积极调整治理结构,排除“朋友圈”对代理人决策的干扰,特别是规避意在通过寻租获取融资机会的劣质投资项目;同时关系网腐败作为一种金融活动终究在金融体系内呈现,金融机构的有效监督和审查可以直接降低均衡腐败水平,即使金融机构不能审查监督,功能性金融中介的存在也可以为腐败官员的圈内人提供额外的投资选择,降低其为腐败官员提供非正式融通资金而获得的正收益。

(三) 金融发展抑制腐败关系网的机制分析

根据上述理论,本文借鉴简·安德维戈(Jens C. Andvig)和卡尔·摩恩(Karl O. Moe)对

① 默顿的金融功能观认为,金融体系的六大基本功能包含:(1) 结算和清算;(2) 聚集并分配资源;(3) 跨时间、跨空间转移资源;(4) 风险管理;(5) 生产信息;(6) 提供激励。

② 《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查》从2011~2013年对2700家企业业主和高管的问卷表明,中国拥有银行授信额度的企业比例只有25.3%,在15个妨碍企业营商的因素中,“融资渠道”以22.4%的占比高居榜首。

③ Ross Levine,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Views and Agenda”,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35, No. 2, 1997.

④ 指反洗钱、反恐融资和反逃税。

公众和腐败官员进行效用分析的思想^①,通过对腐败官员为谋取职位、凭借关系网筹集份子钱的收益模式剖析,从而推导出金融发展抑制官员腐败关系网的机制和效果。

1. 模型假设。假设经济体中最初每个公民拥有等量财产 $M(M > 0)$,当公民没有任何经济活动时,其财产量保持不变(不考虑贬值因素)。假设该经济体总人口数为 N ,其中仅由三类相互独立的群体组成:一是腐败官员 G (包括上、下级官员),二是腐败官员关系网中的圈内人 Q ,三是圈外人即普通群众 P 。三类人群占总人口数的比例固定,他们理性地筹划自有财产的价值增值。

在经营腐败关系网之初,有权提供公共服务的基层腐败官员有机会索取份子钱,去政府办事的企业或个人首先被发展为其关系网中的圈内人。假若下级腐败官员占总人数的比例设为 $\beta, \beta \in [0, 1]$,且 β 外生给定,每个腐败官员向圈内人收取份子钱的数额为 b ,则其攫取的份子钱总额为 $\beta(N-1)b$;腐败的上级官员依靠发展低阶腐败官员获取收益^②,不仅因为这些职位存在腐败租金,下级腐败官员也心甘情愿地支付份子钱,意在维持关系网以换取将来能给他们带来更大利益的官场地位。本文把这笔份子钱设为 $R(b) > 0$,并把其作为既定以便考察份子钱的筹集模式如何影响当腐败水平为 b 时的投资选择。可以假定的是,该份子钱数量为一般普通群众无以承担,否则他们也会竞争该职位,而上级腐败官员倾向于从关系网中选取缴纳数额最多的人,因此下级腐败官员上缴的份子钱 $R(b) > M$,即已经超出其支付能力,必须向其圈内人借钱。

需要指出的是,腐败官员与所有其他人一样需要公共服务,同样会遭受腐败的不利影响,因此经济体中三类公民均等地承受了腐败的负面效用,假设为 $f(b), f(b) > 0$,其不仅包括贿赂官员的份子钱成本,还包括腐败的其他消极效果,如拖延服务时间,缴纳了份子钱“没办成事”,及其所付出的心理成本等。

为便于分析,本文仅比较金融发展从无到有,即不存在发达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和拥有发达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两种情况下,三类群体从腐败行为中的收益情况及其效用函数。

2. 金融发展的较低水平。当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时,所有人难以寻觅正规金融市场,只能投资于非正规金融市场。

(1) 圈外人。即普通群众,他们未加入腐败官员关系网,因此,没有投资渠道无法获取非正规金融市场的投资收益,其效用函数为:

$$F_p^N(b) = M - f(b) \quad (1)$$

(2) 腐败官员。为了模型易于推导,在此设定关系网中下级腐败官员为了牟取更高官阶上缴的份子钱为 $M < R(b) < 2M$,并且只需向一个圈内人借款 $(R(b) - M)$,然后偿还 $(1 + a^N)(R(b) - M)$,其效果类似于开辟了一个非正规金融市场,市场利率为 a^N 。当不存在金融中介时,腐败官员的效用函数是:

$$F_c^N(b) = \beta(N-1)b - (1 + a^N)(R(b) - M) - f(b) \quad (2)$$

(3) 圈内人。下级官员所需要的“份子钱”总额不能完全由其财产或储蓄覆盖,他们至少需要筹集其中一部分。如果金融市场不发达,他们只有求助于圈内人,当圈内人愿意向其融资时,该交易所当然地使圈内人在腐败中占有了一定的“份额”,如果利率为 a^N ,则圈内人在该非正

① Jens C. Andvig and Karl O. Moene, "How corruption may corrupt",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Vol. 13, No. 1, 1997.

② 参见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http://www.ccdi.gov.cn>, 国家监察委已公布多起“长期卖官鬻爵”案例。如安徽泗县原县委书记晏金星 10 年受贿 600 余次,“卖官”近百次。

规市场上“投资”的效用函数是:

$$F_Q^N(b) = M + a^N(R(b) - M) - f(b) \quad (3)$$

利率 a^N 是腐败官员与圈内人共同商定的结果,如果双方不能达成一致协议,则双方效用函数均与圈外普通群众一致。为了双方利益最大化,本文求出使得双方腐败剩余最大化的均衡解 a^N :

$$a^N = \operatorname{argmax}[(F_C^N(b) - F_P^N(b))(F_Q^N(b) - F_P^N(b))] \quad (4)$$

$$\text{令: } L(a^N) = [(F_C^N(b) - F_P^N(b))(F_Q^N(b) - F_P^N(b))],$$

$$\text{有: } L'(a^N) = \frac{\partial F_Q^N}{\partial a^N}(F_C^N(b) - F_P^N(b)) + \frac{\partial F_C^N}{\partial a^N}(F_Q^N(b) - F_P^N(b)),$$

$$\operatorname{Max}[L(a^N)] \Rightarrow L'(a^N) = 0 \quad (5)$$

$$\Rightarrow (R(b) - M)[\beta(N-1)b - (1 + a^N)(R(b) - M) - M] = -(R(b) - M)[a^N(R(b) - M)]$$

$$\Rightarrow a^N = \frac{\beta(N-1)b - R(b)}{2(R(b) - M)}$$

$$\Rightarrow \beta(N-1)b - (1 + a^N)(R(b) - M) - f(b) = M + a^N(R(b) - M) - f(b)$$

$$\Rightarrow F_C^N(b) = F_Q^N(b) = \frac{1}{2}[\beta(N-1)b - R(b)] + M - f(b)$$

由于腐败官员能够获取份子钱利益,即 $\beta(N-1)b - R(b) > 0$,双方便能得到相应的投资收益。当经济体中不存在金融机构时,由上式(4)与(5)推导得出的非正规市场上利率 $a^N = \frac{\beta(N-1)b - R(b)}{2(R(b) - M)}$,此时,腐败官员在和圈内人博弈中均摊了腐败的净剩余,其效用是相同的,即:

$$F_C^N(b) = F_Q^N(b) = \frac{1}{2}[\beta(N-1)b - R(b)] + M - f(b) \quad (6)$$

可见,当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时,关系网中圈内人与圈外人均不具备资产保值增值的渠道,但圈内人凭借关系网向腐败官员缴纳份子钱,二者共同从腐败活动中受益,投资收益大小取决于官员腐败的程度;此时下级腐败官员总是可以通过类似于非正规金融市场的关系网来维持其份子钱缴纳,获取官位之后攫取腐败剩余,只是均衡腐败的程度会随着份子钱的增加而下降,份子钱数额越大,来自腐败的净盈余就越低。因此,腐败程度越严重,腐败官员和圈内人的边际收益便越低。

3. 金融发展的较高水平。经济体中较高的金融发展水平意味着较高的开放程度,金融市场存贷款利率由国际市场决定,假设为 i 。根据前述理论分析,本文假设金融中介可以取得借款人的所有信息而不产生任何费用,当其能够识别为牟取公共部门职位的份子钱项目时,所有的腐败官员将无法在金融市场中借贷,此时:

(1) 普通群众:可以在正规金融市场中投资,其效用函数是:

$$F_P^{CS}(b) = (1 + i)M - f(b) \quad (7)$$

(2) 腐败官员:腐败官员向圈内人借款时,此时圈内人有两种选择:以收益率 i 将钱投资到金融市场中,也可以以利率 a^{CS} 借钱给腐败官员。在向圈内人借款时,腐败官员效用函数为:

$$F_C^{CS}(b) = \beta(N-1)b - (1 + a^{CS})(R(b) - M) - f(b) \quad (8)$$

下级官员如果无法从圈内人处筹集资金,便无从维持与上级官员的“关系”,于是将“退群”

成为圈外普通群众,其效用函数是: $F_c^{CS}(b) = (1+i)M - f(b)$ 。

(3)圈内人:当圈内人不打算借钱给腐败官员,而将所有资金投入到金融市场中,其效用函数是: $F_q^{CS}(b) = (1+i)M - f(b)$;当决定借钱给腐败官员时,则将剩余财富($2M - R(b)$)进行投资,得到效用函数:

$$F_q^{HCS}(b) = M + a^{CS}(R(b) - M) + i(2M - R(b)) - f(b) \quad (9)$$

求出此时双方的腐败剩余最大化的均衡解 a^{CS} 为:

$$a^{CS} = \arg \max [(F_c^{HCS}(b) - F_c^{CS}(b)) (F_q^{HCS}(b) - F_q^{CS}(b))] \quad (10)$$

$$\text{令 } L(a^{CS}) = [(F_c^{HCS}(b) - F_c^{CS}(b)) (F_q^{HCS}(b) - F_q^{CS}(b))],$$

$$\text{有 } L'(a^{CS}) = \frac{\partial F_q^{HCS}}{\partial a^{CS}} (F_c^{HCS}(b) - F_c^{CS}(b)) + \frac{\partial F_c^{HCS}}{\partial a^{CS}} (F_q^{HCS}(b) - F_q^{CS}(b))$$

$$\text{Max}[L(a^{CS})] \Rightarrow L'(a^{CS}) = 0 \quad (11)$$

$$\Rightarrow a^{CS} = \frac{(N-1)\beta b - R(b)(1-i) - 2iM}{2(R(b) - M)}$$

$$\Rightarrow F_c^{CS}(b) = F_q^{CS}(b) = \frac{1}{2} [\beta(N-1)b - (1+i)R(b)] + (1+i)M - f(b)$$

当利率 $a^{CS} = \frac{(N-1)\beta b - R(b)(1-i) - 2iM}{2(R(b) - M)}$ 时,腐败官员和圈内人的效用函数共同为:

$$F_c^{CS}(b) = F_q^{CS}(b) = \frac{1}{2} [\beta(N-1)b - (1+i)R(b)] + (1+i)M - f(b) \quad (12)$$

又已知: $M < R(b) < 2M$,则有:

$$(N-1)\beta b - R(b)(1-i) - 2iM < [\beta(N-1)b - R(b)] \quad (13)$$

由式(11)(12)与(13)可知 $a^{CS} < a^N$, 以及 $F_c^{CS}(b) = F_q^{CS}(b) < F_c^N(b) = F_q^N(b)$, 表明双方从事腐败活动的收益被迫下降了,金融市场的存在及其发达程度直接影响融资的可得性,从而抑制腐败官员筹集份子钱的可能性。可见,金融机构的缺失可能会导致更多腐败,更多普通群众可能被拉拢成为圈内人,较高的金融发展水平意味着功能完善的金融市场和中介机构,能够避免道德风险,从而辨别官员的份子钱项目,间接为腐败官员的圈内人提供了投资机会,阻止了投向腐败贷款的发生,最终抑制了关系网腐败活动从而降低了腐败水平。

三、方法、变量与数据

(一)模型设定

为检验以上路径和机制,本文在传统研究经济增长的框架内建立数学模型并分两步进行:首先检验官员腐败关系网和金融发展各自单独以及二者共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然后检验金融发展抑制腐败关系网的路径和机理及其作用效果。

1. 经济增长效应主方程。当前从内生性视角来研究各种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已成主流,由于对数线性模型可以反映弹性系数大小,具有更明确的经济学含义,本文对变量取对数后考察对数线性关系,为了进一步打开全要素生产率的黑箱,沿袭既有文献将腐败因素和金融发展内生于技术进步当中的做法,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探讨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首先设立

金融发展、腐败关系网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基本计量方程如下：

$$\ln pGDP_{it} = \alpha_i + \beta_1 \ln Fin_{it} + \beta_2 \ln Corr_{it} + \beta_3 X_{it} + \beta_4 D_t + \mu_i + v_t + \varepsilon_{it} \quad (14)$$

式(14)中 GDP 衡量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 Fin 为金融发展水平, Corr 代表官员腐败; X 表示模型中引入的控制变量; 设立 D 虚拟变量验证中共十八大以来强力反腐的效果; 另外, μ_i 表示不随时间变化的各地区固定效应, v_t 表示不随地区变化的时间固定效应, ε_{it} 为随机扰动项。

本文接着构造金融发展与关系网腐败的交互项 ($\ln Fir \times \ln Corr$) 用于检验二者共同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小, 通过与方程(14)中独自作用的对比, 进而揭示金融发展抑制官员腐败关系网的路径:

$$\ln pGDP_{it} = \alpha_i + \beta_1 \ln Fin_{it} \times \ln Corr_{it} + \beta_2 \ln Corr_{it} + \beta_3 X_{it} + \beta_4 D_t + \mu_i + v_t + \varepsilon_{it} \quad (15)$$

由于固定效应模型估计存在一定缺陷, 且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中所包含的滞后因变量与误差项之间的相关性也会引发难以克服的同期内生性, 为加强估计的准确性, 本文继续引入金融发展的一阶滞后项 $\ln Fin_{it-1}$ 建立方程(16), 以解决模型设定和遗漏变量带来的问题:

$$\ln pGDP_{it} = \alpha_i + \beta_1 \ln Fin_{it-1} \times \ln Corr_{it} + \beta_2 \ln Corr_{it} + \beta_3 X_{it} + \beta_4 D_t + \mu_i + v_t + \varepsilon_{it} \quad (16)$$

2. 金融发展对腐败关系网的作用路径方程。本文进一步建立包含二者、官员腐败的一阶滞后项 $\ln Corr_{it-1}$ 、前述 D 虚拟变量以及一系列控制变量的面板数据方程模型(17), 直接检验金融发展对腐败的作用效果和程度, 并观察腐败的传染性。同理建立方程(18)检验同期内生性。

$$\ln Corr_{it} = \alpha_i + \beta_1 \ln Corr_{it-1} + \beta_2 \ln Fin_{it} + \beta_3 D_t + \beta_4 X_{it} + \mu_i + v_t + \varepsilon_{it} \quad (17)$$

$$\ln Corr_{it} = \alpha_i + \beta_1 \ln Corr_{it-1} + \beta_2 \ln Fin_{it-1} + \beta_3 D_t + \beta_4 X_{it} + \mu_i + v_t + \varepsilon_{it} \quad (18)$$

(二) 变量设置与数据来源

1. 官员腐败。国内有学者采用每万人中腐败案件数^①、每万名公职人员的腐败立案数^②来衡量腐败。尽管这种已被发现或查处的官员腐败与真实腐败水平可能存在一定差距, 而且官员凭借腐败关系网收取份子钱的行为大多具有隐蔽性, 如果没有被查处, 公众往往难以知晓, 但是数据显示在官员换届期间, 中国对奢侈表类的进口翻了三倍^③, 而十八大以来的反腐风暴使得像珠宝、高档手表这类奢侈品进口额减少了约 55%^④。况且腐败官员长期缴纳份子钱, 本文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其投资需要“回本”, 因而职务犯罪的概率较高。因此本文采用每万名公职人员中贪污腐败渎职立案数来衡量各地区官员腐败程度。

2.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金融发展就是金融结构的变化, 金融结构指“各种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相对规模”。经典文献对金融发展的衡量中, 无论“戈氏指标”还是麦金农提出的“麦氏指标”, 其主要思路都是度量某个国家或地区金融与经济的相关程度或“经济的货币化程度”^⑤。

① 吴一平、芮萌:《地区腐败、市场化与中国经济增长》,《管理世界》,2010年第11期。

② 刘勇政、冯海波:《腐败、公共支出效率与长期经济增长》,《经济研究》,2011年第9期。

③ Xiaohuan Lan and Wei Li, “Swiss watch cycles: Evidence of corruption during leadership transi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 46, No. 4, 2018.

④ Nancy Qian and Jaya Wen, “The Impact of Xi Jinping’s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on Luxury Imports in China”, *Yale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 2015, <http://www.doc88.com/p-9972814688216.html>.

⑤ “戈氏指标”, 即戈德史密斯(1969)提出的金融相关比率, 其定义为 M2、股票市值及债券余额总和与 GDP 的比值, 是一国金融资产的市场总价值与实物形式的国民财富的市场总价值之比; “麦氏指标”则为麦金农(1973)用一国广义货币总量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衡量。

由于长期以来,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是中国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①,考虑各省域并无 M2 统计,因此本文对金融相关比率作适当修正,采用各省金融机构的存贷款之和与该省 GDP 之比来衡量地区金融发展程度。同时本文借鉴其他学者做法,以人均 GDP 度量各地区的经济增长^②。

3. 控制变量。借鉴文献中对于地区腐败和经济发展的先验研究,本文将影响经济增长和地区腐败的一些其他因素纳入控制变量,这些因素包括各地区的人力资本(HRC)、公职人员工资水平(PubS)、外商直接投资(FDI)和储蓄率(Savrate)。盖里·贝克(Gary S. Becker)和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J. Stigler)首先提出了“高薪养廉”的观点^③,即提高政府雇员工资有助于减少腐败,效率工资会让官员更加珍惜其职位,减少贪污和渎职,而公职人员工资水平亦是国内研究腐败问题的标准变量,但是由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并没有明确的公职人员工资指标,本文采用“城镇单位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平均工资”代表“公职人员工资”,据此计算各地区的公职人员相对工资(PubS),作为各地区的公职人员工资水平。所有变量简明定义及构造见表1。

表1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变量名称和符号 | | 变量定义及测度 | 数据来源 |
|----------|-------------------|---|--|
| 核心变量 | | | |
| 经济增长 | pGDP | 人均 GDP | 国家数据官网(data.stats.gov.cn/) |
| 腐败程度 | Corr | 每万名公职人员中贪腐渎职立案案件数(公职人员采用城镇单位中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就业人员数) | 1. 各省市历年《中国检察年鉴》和《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2. 国家数据官网 |
| 金融发展 | Fin | 金融机构存贷款总和/GDP | 1. Wind 数据库;2. 国家数据官网 |
| 控制变量 | | | |
| 人力资本 | HRC | 人均受教育年限(手工计算,文盲=0年,小学=6年,初中=9年,高中=12年,大专及以上=16年,以每类学历的人口作为权重加权平均) | 《中国统计年鉴》 |
| 公职人员工资水平 | PubS | 城镇公职人员平均工资/GDP | 国家数据官网 |
| 外商直接投资 | FDI | 外商直接投资/GDP(利用历年平均汇率将美元换算成人民币数据) | 1. Wind 数据库;2. 国家数据官网;3.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历年平均汇率 |
| 储蓄率 | Savrate | (资本形成总额+净出口)/GDP | 同上 |
| 虚拟变量 | | | |
| 反腐力度 | D ₂₀₁₂ | 2012年前赋值为0,当年及之后取为1 | |

(三) 数据统计性描述

本文搜集了除中国港、澳、台地区和西藏以外的30个省级单位(自治区、直辖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为了观察十八大以来的反腐效果,采用2003~2016年涵盖中共十六大到十九大前夕的时间序列指标。由于部分省市在个别年份公布的数据中只包括贪腐立案数或涉嫌贪腐人数,此时假定该地区的平均立案数在短时间内是固定的以推算缺失数据。为了减弱实证模型中数据的异方差性并增强其平稳性,更好地满足实证模型对变量正态分布的假定,本文将部分变量数据进行了对数变换,处理后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

① 中国银行业占据了全部金融资产的80%。2017年中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9.44万亿元,其中银行体系发放的人民币贷款13.84万亿元,占比71.2%;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额只有8734亿元,占比4.5%。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网站《2017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统计数据报告》。

② 张勋、王旭、万广华和孙芳城:《交通基础设施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综合框架》,《经济研究》,2018年第1期。

③ Gary S. Becker and George J. Stigler, "Law Enforcement, Malfeasance, and Compensation of Enforcers",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 3, No. 1, 1974.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 变量 | 样本数 | 均值 | 标准差 | 最小值 | 最大值 |
|---------|-----|--------|-------|--------|-------|
| lnpGDP | 420 | 10.181 | 0.713 | 8.216 | 11.68 |
| lnFin | 420 | 0.956 | 0.318 | 0.253 | 2.096 |
| lnCorr | 420 | 3.208 | 0.314 | 2.064 | 4.115 |
| lnHRC | 420 | 2.144 | 0.113 | 1.798 | 2.517 |
| lnPubS | 420 | 1.305 | 0.828 | -0.153 | 3.773 |
| FDI | 420 | 0.324 | 0.398 | 0.032 | 1.721 |
| Savrate | 420 | 0.586 | 0.239 | -0.668 | 1.431 |

四、结果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一) 经济效应主方程

本文对面板数据进行一系列包括 LLC、Breitung、IPS、Fisher-ADF、Fisher-PP 等方法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所有变量都是 1 阶单整序列,协整检验以及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也证实了面板数据的平稳性与协整性,满足建立模型的基本要求。接着利用 Stata15 软件,以是否加入控制变量对方程(14)(15)(16)分别进行两次回归,得到结果见表 3。

表3 主方程(14)(15)和(16)回归结果

| 变量 | (14-1) | (15-1) | (16-1) | (14-2) | (15-2) | (16-2) |
|--------------------------------|----------------------------------|----------------------------------|----------------------------------|----------------------------------|----------------------------------|----------------------------------|
| | lnpGDP | lnpGDP | lnpGDP | lnpGDP | lnpGDP | lnpGDP |
| C | 12.211 ^{*****} 0.775 | 14.189 ^{*****} 0.612 | 13.942 ^{*****} 0.737 | 3.930 ^{*****} 0.963 | 4.451 ^{*****} 1.019 | 3.029 ^{*****} 0.897 |
| lnFin | 2.031 ^{*****} 0.242 | | | 0.346 ^{**} 0.178 | | |
| lnCorr | -1.238 ^{*****} 0.197 | -1.873 ^{*****} 0.164 | -1.747 ^{*****} 0.219 | -0.556 ^{*****} 0.095 | -0.680 ^{*****} 0.113 | -0.503 ^{*****} 0.124 |
| lnFin × lnCorr | | 0.663 ^{*****} 0.082 | | | 0.132 ^{***} 0.058 | |
| lnFin _{it-1} × lnCorr | | | 0.639 ^{*****} 0.103 | | | 0.043 0.054 |
| D ₂₀₁₂ | | | | 0.110 ^{*****} 0.040 | 0.102 ^{***} 0.041 | 0.152 ^{*****} 0.033 |
| FDI | | | | 0.124 0.160 | 0.111 0.157 | -0.013 0.160 |
| Savrate | | | | 0.812 ^{*****} 0.198 | 0.794 ^{*****} 0.203 | 0.733 ^{*****} 0.163 |
| lnPubS | | | | -1.011 ^{*****} 0.143 | -1.035 ^{*****} 0.138 | -0.759 ^{*****} 0.124 |
| lnHRC | | | | 3.950 ^{*****} 0.427 | 3.884 ^{*****} 0.423 | 4.276 ^{*****} 0.350 |
| Method | FE | FE | FE | FE | FE | FE |
| Observations | 420 | 420 | 390 | 420 | 420 | 390 |
| R-sq: within | 0.498 | 0.508 | 0.406 | 0.889 | 0.890 | 0.875 |

注:“*”、“**”、“***”分别表示在 10%、5%、1% 显著性水平上显著,第二行数值为标准差。下同。

1. 由结果可见,无论是核心变量还是分步引入控制变量后,所有方程中腐败关系网($\ln\text{Corr}$)的回归系数在1%显著性水平下全部为负,表明长期以来官员腐败对经济发展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显然,若企业成为腐败关系网的圈内人,长期缴纳份子钱维持“政商关系”,腐败对资源的占用必然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排挤效应,减弱了经济增长动力,降低投资效率从而阻碍经济增长。

2. 金融发展($\ln\text{Fin}$)在不同显著性水平下系数为正,同时在腐败具有强烈负向效果下,无论金融发展当期还是滞后一期,交互项系数亦同时显著为正,基本验证了金融发展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因素,而且能够通过减弱腐败的作用促进经济增长,为金融发展整体功能观的“促进增长论”增添了证据,但具体效果还有待路径方程予以证实。

3. 观察十八大前后反腐败的效果,(14-2)(15-2)和(16-2)中均可以看出,虚拟变量 D_{2012} 的系数为正且显著性水平相对较高,说明强力反腐净化了执政党队伍,“党管干部”促进了经济增长,为反腐败的正面经济效果提供了支撑。

4. 控制变量中,人力资本和储蓄率的系数均显著为正,是经济增长强有力的拉动因素,符合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但是公职人员工资水平的系数显著为负数,说明提高公务员工资并不能促进经济发展,“高薪”未能激发官员对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其原因可能在于收入水平的提高相应地增加了腐败的租金规模,进而可能激励腐败官员更多地参与腐败关系网。

(二)作用路径方程

为进一步检验金融发展对官员腐败的抑制效果,本文利用路径方程(17)和(18)进行了分步回归,结果见表4。

表4 路径方程(17)与(18)的分步回归结果

| 变量 | (17-1) | (17-2) | (18-1) | (18-2) | (17-3) | (17-4) | (17-5) | (18-3) |
|-------------------------|--------------------------------|---------------------------------|---------------------------------|---------------------------------|---------------------------------|---------------------------------|--------------------------------|--------------------------------|
| | $\ln\text{Corr}$ | $\ln\text{Corr}$ | $\ln\text{Corr}$ | $\ln\text{Corr}$ | $\ln\text{Corr}$ | $\ln\text{Corr}$ | $\ln\text{Corr}$ | $\ln\text{Corr}$ |
| C | 1.263 ^{****} 0.114 | 3.571 ^{****} 0.067 | 3.485 ^{****} 0.07 | 1.445 ^{****} 0.137 | 1.501 ^{****} 0.142 | 3.361 ^{****} 0.083 | 1.922 ^{****} 0.527 | 2.027 ^{****} 0.523 |
| $\ln\text{Corr}_{it-1}$ | 0.597 ^{****} 0.035 | | | 0.581 ^{****} 0.036 | 0.567 ^{****} 0.037 | 0.573 ^{****} 0.038 | 0.543 ^{****} 0.040 | 0.550 ^{****} 0.040 |
| $\ln\text{Fin}$ | | -0.379 ^{****} 0.069 | | | -0.142 ^{****} 0.051 | -0.178 ^{****} 0.069 | -0.156 ^{***} 0.075 | |
| $\ln\text{Fin}_{it-1}$ | | | -0.317 ^{****} 0.074 | -0.136 ^{****} 0.057 | | | | -0.113 ^{**} 0.072 |
| D_{2012} | | | | | | -0.105 ^{****} 0.019 | 0.040 0.024 | 0.030 0.023 |
| FDI | | | | | | | 0.129 ^{***} 0.063 | 0.145 ^{****} 0.063 |
| Savrate | | | | | | | 0.036 0.070 | 0.017 0.069 |
| $\ln\text{PubS}$ | | | | | | | 0.041 0.068 | 0.015 0.066 |
| $\ln\text{HRC}$ | | | | | | | -0.216 0.225 | -0.275 0.221 |
| Method | FE | FE | FE | FE | FE | FE | FE | FE |
| Obsr | 390 | 420 | 390 | 390 | 390 | 420 | 390 | 390 |
| R-sq; within | 0.440 | 0.072 | 0.049 | 0.449 | 0.452 | 0.110 | 0.463 | 0.461 |

1. 从表4可见,模型除(18-3)外,无论是金融发展当期还是滞后一期对官员腐败作用的系数都显著为负,表明金融发展抑制腐败效果十分显著,从而证实本文理论路径和机理分析。

2. 所有腐败程度的滞后项系数都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上期腐败明显能够传递到下一期,证实了腐败具有“传染性”。由于腐败关系网是群体腐败的基础,组织内首个收取份子钱的腐败上级官员对其下属具有明显的示范作用,使得“大鱼吃小鱼”的层级式关系路径成为腐败病毒的传染源,进而形成“上行下效”。

3. 在控制变量中,本文只发现了外商直接投资(FDI)助长了腐败,原因在于FDI为弥补其国外竞争劣势或者为获得东道国基础设施投资、资源开采等高利润项目,贿赂行为的发生概率可能增加,同时东道国政府腐败官员期望利用权力牟取利益的机会增多,从而加剧了腐败^①。

(三) 稳健性检验

本文以十八大召开时间2012年为分界点,将原始的面板数据分为两部分进行回归,既可以分段检验各变量关系的稳健性,还能够对比十八大前后的反腐败效果。基本经济效应主方程(15)和(16)、路径方程(17)和(18)的分段回归结果分别见下表5和表6。

表5 主方程(15)和(16)分段回归结果

| 变量 | 2003~2011年 | | | | 2012~2016年 | | | |
|-------------------------------|----------------------|----------------------|-----------------------|----------------------|----------------------|----------------------|----------------------|----------------------|
| | (15-1) | (16-1) | (15-2) | (16-2) | (15-1) | (16-1) | (15-2) | (16-2) |
| | lnpGDP | lnpGDP | lnpGDP | lnpGDP | lnpGDP | lnpGDP | lnpGDP | lnpGDP |
| C | 14.330 **** 0.393 | 13.950 **** 0.447 | 6.632 **** 0.937 | 6.075 **** 0.984 | 10.562 **** 0.267 | 10.776 **** 0.273 | 9.646 **** 1.027 | 12.049 **** 0.925 |
| lnCorr | -1.447 **** 0.136 | -1.303 **** 0.154 | -0.604 **** 0.076 | -0.450 **** 0.088 | -0.191 *** 0.085 | -0.248 **** 0.078 | -0.265 **** 0.093 | -0.306 **** 0.084 |
| lnFin × lnCorr | 0.084 0.08 | | 0.012 0.042 | | 0.239 **** 0.026 | | 0.285 **** 0.037 | |
| lnFin _{t-1} × lnCorr | | 0.069 0.079 | | -0.096 **** 0.043 | | 0.246 **** 0.031 | | 0.275 **** 0.042 |
| FDI | | | 0.052 0.143 | -0.075 0.144 | | | -0.358 **** 0.112 | -0.417 **** 0.111 |
| Savrate | | | 1.321 **** 0.147 | 1.131 **** 0.165 | | | 0.129 0.099 | 0.015 0.106 |
| lnPubS | | | -1.510 **** -0.127 | -1.428 **** 0.135 | | | -0.362 **** 0.115 | -0.230 *** 0.095 |
| lnHRC | | | 3.077 **** 0.372 | 3.226 **** 0.385 | | | 0.651 -0.451 | -0.366 0.392 |
| Method | FE | | | | FE | | | |
| Observations | 270 | 240 | 270 | 240 | 150 | 120 | 150 | 120 |
| R-sq: within | 0.357 | 0.281 | 0.842 | 0.819 | 0.412 | 0.461 | 0.558 | 0.586 |

1. 从表5可知,无论是否控制其他变量,所有腐败水平系数均显著为负,再一次有力证明了腐败是经济增长的“掠夺之手”。

^① Christopher J. Robertson and A. Watson, “Corruption and Change: The Impac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 25, No. 4, 2004.

2. 观察金融发展与官员腐败交互项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效果,在金融发展当期以及滞后一期时,相比于单独腐败变量的负面作用,在十八大之前交互项系数表现出不显著和轻微负向效应(-0.096^{***}),意味着金融发展抑制了腐败,减弱了腐败负面效果,证实了笔者的机理分析;而且,十八大之后系数改变为显著为正且数值增加,表明金融发展和腐败交互项的经济效应增强,证明了十八大严惩腐败以来为经济发展营造了空间;继续结合表6,对金融发展与官员腐败的路径方程检验可见,金融发展当期及其滞后期对腐败的抑制效果由十八大之前的部分显著变为十八大之后全部显著,金融发展抑制腐败的有效作用再一次得到了证实。其可能的解释是由于金融业向来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出现腐败问题“重灾区”,十八大部署的金融反腐强化了金融监管,优化了金融营商环境从而促进了金融发展。

3. 从表6对腐败传染性检验看出,十八大之前腐败程度的滞后项系数一直显著为正,表现出强烈的传染性,十八大之后的系数虽然为正,但是并不显著,可以认为腐败在时间上的传染效应基本消失,中共十八大强力反腐政策对腐败官员的打击初见成效,破除或抑制了官员腐败关系网,腐败得到遏制。

4. 表5对公职人员工资水平(lnPubS)分段检验继续支持了提高公务员工资水平并不能促进经济发展,但十八大之后对经济增长的负向作用却在减小,显示了十八大反腐倡廉在公务员队伍中得到了正面回应。因此有效的反腐败制度能够对官员的行为提供适当的奖惩,提高公务员薪水可以降低腐败的诱惑力,使其对腐败比对清廉的期望收益更低。

5. 综合表5和表6,各变量的参数估计值与前文相比,总体上基本一致,上文得出的结论在分段回归结果中仍然可以体现,无论使用虚拟变量还是分段回归都具有稳健性。

表6 路径方程(17)和(18)分段回归结果

| 变量 | 2003 ~ 2011 | | | | 2012 ~ 2016 | | | |
|------------------------|--------------------------------|---------------------------------|---------------------------------|---------------------------------|---------------------------------|----------------------------------|-----------------------------------|----------------------------------|
| | lnCorr | lnCorr | lnCorr | lnCorr | lnCorr | lnCorr | lnCorr | lnCorr |
| C | 1.736 ^{*****} 0.21 | 1.529 ^{*****} 0.186 | 2.420 ^{*****} 0.770 | 2.322 ^{*****} 0.775 | 3.344 ^{*****} 0.311 | 3.528 ^{*****} 0.31 | 3.522 ^{*****} 1.229 | 3.594 ^{*****} 1.205 |
| lnCorr _{it-1} | 0.512 ^{*****} 0.05 | 0.534 ^{*****} 0.049 | 0.457 ^{*****} 0.054 | 0.460 ^{*****} 0.054 | 0.096 0.101 | 0.065 0.098 | 0.096 0.106 | 0.084 0.102 |
| lnFir | -0.210 ^{***} 0.11 | | 0.102 0.116 | | -0.467 ^{*****} 0.09 | | -0.319 ^{***} 0.171 | |
| lnFin _{it-1} | | -0.057 ^{**} 0.102 | | 0.023 0.108 | | -0.574 ^{*****} 0.103 | | -0.435 ^{*****} 0.163 |
| FDI | | | 0.151 0.115 | 0.175 0.112 | | | 0.029 0.155 | 0.134 0.149 |
| Savrate | | | 0.052 0.126 | 0.065 0.130 | | | 0.064 0.145 | 0.084 0.142 |
| lnPubS | | | 0.087 0.102 | 0.129 0.106 | | | -0.351 ^{*****} -0.132 | -0.144 0.120 |
| lnHRC | | | -0.393 0.302 | -0.424 0.301 | | | -0.094 0.533 | -0.070 0.521 |
| Method | FE | | | | FE | | | |
| Observations | 270 | 240 | 240 | 240 | 120 | 120 | 120 | 120 |
| Adj R ² | 0.369 | 0.359 | 0.394 | 0.392 | 0.234 | 0.259 | 0.247 | 0.276 |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金融功能观理论,对腐败官员通过关系网筹集份子钱的收益进行了效用分析,阐释了金融发展降低官员腐败水平,最终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和路径,然后根据传统生产函数建模,并以2003~2016年中国30个省市数据进行经验检验。研究表明:一方面,官员腐败具有明显的传染性且对经济发展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反腐风暴阻断了腐败传染效应,促进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金融发展不仅自身显著促进经济增长,而且可以经由抑制官员腐败关系网具有正向经济效应:当金融发展水平较低而制度缺失时,不同层次的腐败官员通过关系网筹集份子钱,与圈内人共同分享腐败收益;但高度的金融发展能够避免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发挥监督和识别功能,为腐败官员的圈内人提供更多投资机会,降低官员腐败收益从而遏制腐败。进一步地,本文的检验还表明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强化了这种机制。因此,本文肯定了执政党开展反腐败斗争,破除官员腐败关系网的政策效果,为反腐提供了更多的理论和政治支持。

本文的政策含义是显而易见的:第一,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中国金融发展水平尚待提高,金融市场功能尚不完善,结构性失衡仍然存在,官员腐败危害社会正义和经济增长,因此仍需要不断克服金融内在“成本”,大力提升金融功能,积极稳健地促进金融发展,从而抑制腐败。第二,遏制官员腐败的治本之策也在于根除腐败关系网的制度基础,规范官员晋升程序,使其从单纯依靠自律向自律他律并重转变,因而“倡导规矩的上下级关系”,加强官员的任期控制以及异地交流等“隐性治理”手段都是破除官员之间盘根错节“利益型关系网络”的有益实践。第三,针对中国金融发展中频发的腐败官员控制金融资源、干预金融以及金融监管腐败,反腐败的制度设计重点还在于完善金融企业治理结构,严格金融体系外部审计制度,辅以纪检监察部门的事后调查,尤其应更新与改进金融监管理念、方法和制度,特别是加快金融双向开放,简化金融领域的行政审批,实现金融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最终促进金融发展。

作者:王勇、王鹏飞、张佐敏,海南大学经济学院(海口市,570228)

(责任编辑:林立公)